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上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 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 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牺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袄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70页。

序

程兆奇

这本“文革”社会生活史是大陆长年研究“文革”的第一部专著，值此出版之际，对老友谨致由衷祝贺。

我和大陆相识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打乱秩序的“革命”喧嚣已经过去，社会重新回到了比十七年更甚的压抑和沉闷的轨道，前程茫茫，任何向往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由于我们生长的时代自始就是一个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封闭环境（就“隔绝”而言“竹幕世界”并非诬词），其实对怎么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也一片茫然。但渴望自由的心火并没有熄灭。当时大陆写了不少小说、诗歌，具体内容和词句今天已不复记忆，对未来憧憬的印象则至今犹存在我的脑际。那个时代极度贫乏，唯有人力无法改变的“光阴”可以恣意挥霍，我们在一起不知聊过多少个日夜。回想起来，大陆立志把身经的时代写下来的想法就是在那时种下的。以后大陆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这一想法从未动摇。这些年大陆每当发现罕见的新材料，或采访重要的当事人，都会及时让我分享，不过我从未听大陆谈过为什么他要持久坚持研究“文革”。我想大陆的原动力应该和大陆在“文革”中的特殊遭遇和感受有关。这

一点有必要稍作说明。

“文革”在它结束后的不久即被定性为“灾难”，这是1949年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不留尾巴彻底否定的唯一例外。今天对“文革”的多样看法固然是因为“伤痛”的淡忘，更重要的还是随着距离的拉开，可以较容易从广阔的视野中看到“文革”的不同面相。即使从灾难着眼我们看到的与以往也已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文革”和十七年，是意外的歧出还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或者说十七年是不是“理想国”，今天的认识都远较当年丰富。但无论如何，“文革”对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确实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在这个巨大灾难中每个个体的情况当然会有不同，大陆的手足之亲直至“文革”后期仍遭飞来横祸，可以说他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民族是真正称得上患难与共的。所以，大陆致力于“文革”研究不同于对待一般的“学术”课题，当然更不是闲情逸致式的兴趣。

我在这里特别交代大陆的“家国之痛”，是想说明为什么大陆本来完全有资格和理由像时下海内外大多数有关著述一样对“文革”作批判性的反省，而呈献给读者的却是一部“学术”型的专书。

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但万变不离其宗，研究历史总还是要以真实的人事为对象，总还是以求解真相为目的。即使认为史料不能摆脱记述者的主观因此真实本不可知的极端主张，也不可能放弃求真的努力，否则便与史学无关。大陆近年主要是通过广征史料来梳理史实，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但大陆选择这一方向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有感于相关著述对史实的轻忽。

“文革”是我们及身的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亲切的体会，这点对我们认识“文革”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说，“亲历”既不能保证记忆不误，也不能保证观察无偏；有时因情所系反而会遮蔽理

性的眼光。大陆所举“文革”时期上海是否使用过“肉票”的讹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所以主有者形诸笔墨时便毫无犹豫，理所当然。其实“文革”未用肉票记载明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中就有现成答案。这一点最可说明：一、束书不观但凭印象的不可靠；二、误记已成常识；三、因此，传达正确的知识就有了格外的必要。说到志书，本书“人口史”、“经济生活史”等章节的有些结论多有迳援志书之处。我想大陆在这点上所取的宁失于“浅”勿失于疑的态度，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写史者的当取态度。我说的“浅”不是指“义理”上未作深论，作为社会生活史的一种，大陆此卷和全书一样，主要是叙述各个时期和各类群体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做理论上的总结，或借“社会生活”之酒浇自己的块垒；我说的是大陆对上海“文革”史料的掌握不在任何人之下，所叙相当部分内容的第一手材料都曾经眼，但在援引根据时大陆尽可能以新修志书为据，未作繁复征引。我想除了尊重前人劳动成果之意，大陆的考虑主要是志书取材多为官方文献（官私记录的信疑不可一概而论），修订也有较严格的程序，在知识的准确性上相对较高。这在“炫博”成为时尚的今天，大陆这样的朴实作风比他无征不信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

除了上述“有案可稽”的章节，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如“上海红卫兵大串联”、“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野营拉练”等都由大陆从广泛史料的耙梳中第一次概括。这些部分最见搜寻之功，相当不易。也许在“过来人”看来，小报、毛像、拉练……即使不说耳熟能详，至少并不陌生，但就认识“全面”而言，通过信实证据建立起来的史实毕竟不是一己体验或道听途说所能及。这里所说的“全面”既是指来龙去脉的全貌，也是指反映实情的深入。

在此不妨举书中一例以为证明。“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文革”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我们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实实情的写照。大陆通过当时市革会政宣组的《政宣简报》等“内部文件”却告诉我们，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贬斥的时期，居然仍有人以盈利为目的贩卖宣传革命的小报。如果不是深掘材料，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与外表全然不同的真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以“非常与正常”作为这部叙述性作品的主题的用心。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静止时期，所谓“死水一潭”、“天翻地覆”，不过是形容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的变化大小而已。所以，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文革”虽是“非常”，也只是“常”中之变的较激烈时期，而非完全逸出常道的“反”“常”。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天下大乱”的“文革”“非常”期，不仅国家没有分崩离析，众生的“社会生活”也在照常进行，其中原因正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还在“正常”运转。其实不仅是社会生活，从最大处说，“文革”和十七年，国体、政体没有变化，领导阶级没有变化，经济体制也没有变化……鸟瞰整个共和国史，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毋宁说改革开放才是相当程度上的“非常”，而“文革”则是其来有自，变中有常。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文革”不是“非常”，和沉闷的十七年比，“文革”的大起伏当然是“非常”，我只是说“文革”的“非常”和十七年的“正常”实有一脉相连的关联。所以大陆以“非常与正常”命题确是一个有洞察力的概括。

本书是大陆研究“文革”的第一本专书，对大陆涉猎的上海“文革”的广泛方面而言只是一个局部。大陆正在着手和已列入计划的工作，最让人期待的是他和上海研究“文革”的两金中的另一金、复旦大学的金光耀先生合编的上海“文革”史料汇编。这个史料汇编以专题结集，对利用者相当方便，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特点，它的最大特

点是凡与上海“文革”有关的有价值的材料都在收编之列,没有“画地为牢”,预先设定规模。这样开放的结果,将来究竟会编成怎么样的一部大书,实难逆料,从已分门别类的专题看,编出数十卷应该不在话下。史料汇编之外,同样十分有价值的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王、张、姚、徐(景贤)的年谱长编。“长编”与一般年谱的不同在于征引原材料;而大陆所编的不同,在于大量引用的公私文献不仅是“第一手”,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尚未出版甚至尚未印刷,从从未为人援用的角度说,称得上是“珍本秘笈”。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金”的工作尤其是大陆的工作对上海“文革”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大陆命我作序时希望我能就自己对“文革”的心得作一篇“长篇大论”,考虑再三,觉得谈不出既有价值又符合主旋律的看法,而且借题发挥也未免不敬,所以就以预告也是预祝大陆的新成就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句。

题 记

金大陆

“文革”运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得进行，以至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前者附着于“非常”，是“非常”的调节机能的显示和表达，故会产生“正常中的扭曲”；后者拉扯着“非常”，是“非常”的制造功能的扩展和延伸，故会产生“正常中的妄为”。所以，不管是非常中的正常（顺应与应对）；还是正常中的非常（扭曲和妄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交汇和兼容，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相和精彩题旨，以至它既说明了时代的错乱，又在本质上证实了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立足在这个判断上，以非常与正常的交错关系，将“文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不仅可构建一个有血肉、有灵魂的研究文本，更能从中看到血肉躯体之伸缩；读到灵魂归附之挣扎。

目 录

总序	熊月之	1
序	程兆奇	9
题记	金大陆	15
第一章 上海(市区)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		1
一、总人口与总户数		1
二、各区人口分布情况		4
三、人口自然变动		7
四、若干区的人口自然变动		9
五、人口机械变动		11
六、人口性别构成		15
七、人口年龄构成		17
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他		20
第二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婚姻管理		25
一、结婚登记情况分析		25
二、离婚登记情况分析		30
第三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		38
一、“文革”前的工作基础		38